

三线企业选址与内地工业 协作关系研究(1964—1969)*

张 杨

摘要:三线建设是在国际冷战格局下中共中央实施的一项国防备战工程。三线企业选址遵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进山进沟进洞,导致基建投资过大、生产成本上升、协作关系缺乏,严重影响三线企业的生产经营。为解决内迁企业的协作问题,各级部门采取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兴建小城镇、从一线搬迁配套企业、由沿海进行技术支援等方式,在三线地区初步建立起配套协作的工业体系。

关键词:三线建设;企业选址;“六字”方针;工业协作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21.05.024

历时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保障下,数百万三线建设者从东部沿海来到西部内陆,投资兴建了两千多个大中型企业,深度改变了我国工业的整体布局。改革开放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市场的冲击,使三线企业经历了艰难的转型,因此有学者对三线建设基本持否定态度,比较集中的批评意见是选址失当对三线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障碍。^①

21世纪以来,学界出现了三线建设研究的热潮,尤其是对三线企业选址有了若干新的看法。段伟对甘肃天水三线企业进行历时性研究,指出“天水的三线企业不仅在逆境中存活下来,还发展得很好,这与当初在企业布局中没有严格按照‘山、散、洞’的方针迁建有关。

虽然有的三线企业发展并不顺利,但主要是经营、管理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地理位置。”^②王毅对重庆化工产业进行深描,认为“三线建设中重庆地区的化工企业不仅完善了化学工业的门类,而且改变了重庆化学工业的布局,形成了沿江地带的综合性化工区和长寿—洛碛化工区。”^③郑有贵、陈东林、段娟考察川渝两地的三线建设,提出“‘两点一线’的生产力布局是一个战略构想,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④张勇、肖彦考察了四川彭州的锦江、岷齿、湔江三家单位选址过程中中央、地方和企业三方的互动。^⑤

与此相对,徐有威、陈熙则认为三线建设“尽管形成了诸如攀枝花、德阳、六盘水等一批新兴的工业城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8JZD027)的阶段性成果。

① 辛文:《对三线建设的一些认识》,《计划经济研究》1982年第8期。

② 段伟:《甘肃天水三线企业的选址探析》,《开发研究》2014年第6期。

③ 王毅:《三线建设中重庆化工企业发展与布局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2期。

④ 郑有贵、陈东林、段娟:《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基于四川、重庆三线建设的调研》,《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

⑤ 张勇、肖彦:《三线建设企业选址的变迁与博弈研究——以四川三家工厂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市,但大多数的工厂在布局时仍刻意避开人口密集地区,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工业集聚效应”。^①董志凯在论述沿海企业搬迁时指出:“能否重建协作关系与市场网络、科学规划城镇决定搬迁的成败。”^②基于上述学者的研究和争论,本文主要利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档案和已公开中央高层文献,探讨三线企业选址所遵循“六字”方针的内涵、弊端及解决路径,进而分析三线建设与内地工业协作体系建立之间的关系。

一、三线企业选址“六字”方针的内涵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我国面临严重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国防备战活动。1964年4月25日,总参作战部向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报告我国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时指出我国“工业过于集中。仅14个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并且“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等种种问题。^③因此,需要以国土防卫为出发点,对全国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进行布局调整。

1960年2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时,提出我国国防工业布局要符合反侵略战争的要求,厂址选择要坚决贯彻“靠山、隐蔽、分散”的原则,尽可能在山洞或地下建设,并且要有防核、防化学的防护设施。^④周恩来亦于1964年1月31日指出:“为了国防安全,应该尽快地调整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布局,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建设后方基地。”^⑤早期工业布局的“六字”方针模式仅限于对核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要求,而未涉及基础工业。

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发生后,在“准备打仗”的气氛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由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人组成的国务院专案小组提出:“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

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并规定全国范围内“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⑥

因此,“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成为三线企业选址最重要的原则。1964年9月至11月,由赵尔陆率领国防工业各部门组成的勘察选厂工作队先后前往甘南、陇南、陕北、陕南、宁夏、四川、贵州、滇东北、鄂西、湘西等地踏勘了1449个点,经过对比分析选出适宜建厂的682个点,罗瑞卿报告称:“这些选点,基本上靠山进沟,离开现有城市,少占耕地。”^⑦

按照中央要求,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在建设中是不是认真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是关系到战时三线能不能发挥作用的大问题。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从战争的要求出发。”^⑧而国家建委则要求:“少数国防尖端工业,比如二机、七机等部所属的一些项目,不能强调算经济账,必须按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进行建设。”^⑨从中央到地方,对“六字”方针的屡次提倡,成为内迁企业布点的基础。

“靠山”即企业应该建在山脚,利用山势进行掩蔽。1964年10月9日,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程子华给李井泉汇报称:“必须统一规划并统一布局,才能做到布局合理。……军事工业摆在嘉陵江到渠江两岸的华蓥山地区和沿乌江两岸地区。这两个地区,地势很隐蔽,并有许多天然溶洞。”^⑩四川省机械厅在三线企业搬迁入川之前,亦向四川省委建议“动员各专区,靠山、靠洞预建20—30个摊子”,以作为搬迁企业前进和落户的基地。^⑪靠山是企业隐蔽的最好方式,甘肃省计委在企业迁入之前到各地寻找适宜建厂的山沟:“天水地区有几条大沟,如街子口至石嘴子、藉口至杨家湾、西五十里铺至关子镇,以及小陇山区、娘娘坝、永川沟的红岩等沟,条件均好,适宜摆一些隐蔽的国防工业。……武威地区,有一些隐蔽的山沟,如华尖子、双腰湾等,可以

① 徐有成、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② 董志凯:《三线建设中企业搬迁的经验与教训》,《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③⑥⑦⑨ 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55—56、71—22、144、166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1927—1996)》(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21页。此点承陈东林先生惠示,在此表示感谢。

⑤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

⑧ 《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1964年4月30日,甘肃省档案馆,143—003—0768—0028。

⑩ 《程子华、阎秀峰关于以重庆为中心工矿配套、西南区工业布局、选厂定点及煤、电、交通运输等情况的汇报》,1964年10月9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内部资料,2017年,第331页。

⑪ 《省机械厅分党组报省委关于三线建设中,地方机械调整、布局、迁厂有关问题的汇报要点》,1964年9月15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16页。

开山打洞。”^①

因此,内迁企业基本被安排在距离城市较远的深山之中。如国家计委决定将上海九〇一厂铜管、棒车间、上海慎昌铜管厂设备、辽宁苏家屯加工厂的铅材加工车间和本溪合金厂的部分合金熔炼及轧机(约五百人)迁到甘肃白银厂十公里山沟里建设西北铜、铅、锌加工厂。^②同时,将吉林二〇一厂生产特殊石墨制品的全部设备和人员(一千五百人),搬到西宁、兰州之间的山沟里,解决生产原子能和导弹需要的高纯石墨制品。^③三线企业基本都建在两山中间的夹沟之中。

“分散”即工业不能过分集中于大城市,而应该分散到各地布局。如西北地区1964年安排的46个三线项目,即分散在西北四省18个点上。接纳三线企业之前,甘肃省计委组织了三个综合勘察组前往河西走廊等地进行实地勘察,随后提出“对兰州市采取‘严格控制、积极疏散、发挥作用’的方针。原则上不再摆新项目,现有企业一般不再搞大的扩建”^④，“根据分散、隐蔽的原则和现有条件,拟在酒泉、张掖、山丹、武威、靖远、定西、陇西、天水、平凉等地要摆一些厂子。”^⑤

四川省计委亦注意到之前的工业多集中于成都、重庆和铁路沿线,布局不够合理:“我省原有工业主要集中在重庆、成都、自贡、宜宾、绵阳等地区,而今年搬迁项目百分之八十分布在铁路交通沿线上,其中又以重庆、成都、绵阳、宜宾为最多,这样,工业布局越来越密,目标显著,不利于国防安全。”^⑥因而四川省计委提出内迁四川的企业应尽量避免开成都、重庆两市考虑,着重布局在“宜宾以下长江沿岸,以及嘉陵江、涪江、渠江、乌江、沱江两岸地区;成昆(峨眉以南)、川黔、德天、广旺、广三、宜珙、资威等铁路沿线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有些中小型企业可以考虑放在乐山、南充、雅安、达县等公路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⑦

“分散”不仅仅是整体工业布局的分散,也包括企业自身的分散。西北局要求:“已经选定厂址的新建企业,在建筑布置上,要打破城市的框框,搞村落式,不摆

四方块,不搞大围墙,尽可能从外表上清除工厂的特征。在生活区的建设上,可以搞分散的居民点,也可以在周围村庄插队建房。”^⑧即希望将工厂的特征隐去,以村庄的形式藏于民间。第三机械工业部在四川的建设项目基本全部布局在山区,并自认已经做到了中央指示的“六字”方针,把企业用房建在一起,然而却遭到上级部门的严厉批评,于是其“按上级指示把设计方案又重新改变,不但在总体布局上拉散,一个单位分散为几个点,即使在一个点,房屋布置亦就地形拉散,在单个厂房又采取靠、镶、嵌、进洞、埋地等隐蔽措施。”^⑨即企业应该按照生产区、生活区分散布局,防止工厂集中一团、对空目标过大。如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将搬迁企业拆分成众多独立的小型车间和居民点,沿山沟分散布局,如三机部下辖的十一所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形成一线五点,相距达20公里。^⑩

靠山、分散布局方式目的是为了隐蔽,三线企业大多属于国防尖端工业或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型工业,搬迁目的即在三线地区重建一套战时工业生产体系。因此,三线企业在建成之后,必须利用一切手段进行伪装,防止过分暴露自己。陕西省宝鸡市委要求:“凡老厂扩建和新建工程已基本建成的,都必须采取积极措施,进行伪装,大搞植树绿化,涂保护色。植树造林要自己动手,多栽速生高杆树,使其尽早成林。”“桥梁厂准备大量植树造林、绿化厂区,进行伪装。”^⑪即利用绿化手段,将企业隐蔽在树林之中。

隐蔽主要针对防空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空军和防空力量相对薄弱,而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又屡次侵入内地,窥伺情报,刘少奇分析称:“它的优势就是海军、空军、原子弹、导弹,海军、空军的优势是有限制的。用地面部队到中国来,我们不怕。”^⑫敌人优势集中于空中,三线企业即便靠山、分散,仍有可能暴露目标。西北局指示各地: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防空问题十分重要,要特别注意隐蔽。选择厂址,尽量利用自然地形。……正在新建的企业,凡不符合

① 《甘肃省计划委员会关于三线建设情况汇报(第三次)》,1964年11月24日,甘肃省档案馆,144-001-0542-0051。

② 《甘肃省计委关于1965年搬迁企业给西北局的报告》,1964年11月2日,甘肃省档案馆,144-001-0549-0015。

③ 《一九六五年工业交通企业和国防工业企业从一线迁建到西北三线项目》,1964年11月4日,甘肃省档案馆,144-001-0549-0017。

④ 《甘肃地区三线生产建设七年发展》,1968年9月,甘肃省档案馆,185-001-0004-0001。

⑤ 《甘肃省计划委员会关于三线建设情况汇报(第二次)》,1964年10月16日,甘肃省档案馆,144-001-0586-0003。

⑥ 《省计委关于一九六五年搬迁项目迁建情况汇报》,1965年8月17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51页。

⑦ 《省委办公厅关于三线建设的若干问题》,1964年9月11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3页。

⑧ 《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1966年4月30日,甘肃省档案馆,143-003-0768-0028。

⑨⑩ 《第三机械工业部四川地区办事处一九六六年基本建设工作的几点体会》,1967年4月1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288、288页。

⑪ 《中国共产党宝鸡市委员会关于1966年上半年三线建设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4日,宝鸡市档案馆,6-2-5。

⑫ 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159页。

防空要求的,要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补救。”^①甘肃省基本建设委员会随即向各企业提出要求:“现有厂子应积极采取防空措施,严禁反光、发光、异色的标志出现。”^②因此,利用一切手段隐蔽,使具有空中优势的敌人不易发现,是三线企业建厂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首要原则。

事实上,对于从东部沿海和东北沿边迁至三线地区的企业和人员来讲,进入内地、进入山区即意味着遵守了“六字”方针,且企业建在深山之中,既不利于生产,也不利于生活,还会增加基建投资。于是一些内迁企业贪图便利,并未严格遵守建厂原则,这种思想和行为遭到了决策部门的大力批判。四川省机械厅认为内迁人员普遍有两重思想障碍:“(1)战备观念不强,对现代战争缺乏正确认识。认为已经地处大后方,保险;或者消极认为,现代战争,不分前后方,隐蔽不隐蔽都是一个样;(2)拘泥于老一套建设框框,山高水深条件差,顾虑重重,实际上是迷恋城市‘优越生活’。”^③

宝鸡市委将不遵守“六字”方针的企业定性为对中央精神领会慢、浅、备战观念不强,在检查企业布局时发现:“有的靠山不隐蔽,如桥梁厂、秦川机床厂、电厂等;有的既不靠山、更不隐蔽,如渭河电器厂、消防器材厂、铲车厂、仪表厂等。新选点新建的,同样有靠山不隐蔽,如氮肥厂、九〇二厂等;有的既不靠山,也不隐蔽,如西北列车电站基地。而不论哪一种情况的建筑物都不分散。”^④针对不符合“六字”方针的企业,除严厉批评之外,甚至还要重新选址、修改设计。

二、三线企业选址所引发的问题

现代化工业大生产需要基本的原料、交通、市场、分工等各方面协作,方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然而,三线企业大多属于高、精、尖的国防工业和为之配套的基础工业,其主要考虑的因素并非经济效益,而是战争情况下的国防安全,集中体现为企业选址过程中“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这种看似与现代工业布局相悖的选址原则,在“山雨欲来风

满楼”的国际局势下,虽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其负面效应也十分突出,集中体现为:增加企业搬迁成本、上下游产业缺乏协作。

(一)增加企业搬迁成本。

近代以来,我国工业发展基本上是“沿海先行,领先内地”,虽然在一五计划时期有所调整,然而三线地区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尤其是工业生产所必需的水、电、燃料、场地等并未预先规划安排,甚至缺乏基础资料,导致三线企业在搬迁之初不得不自行解决。甘肃省计委向西北局汇报称:“根据‘分散、隐蔽、靠山’的原则,后方建设,必须考虑在新的地点布点,如张掖、天水、陇西、靖远等,但这些地区的基础都很差。特别是水文地质资料,这是大家在选厂工作上感到最困难的问题。甘肃工业布局,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有水没水或水多水少来决定。”^⑤

同时,三线企业搬迁至内地,放弃了地势平坦、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大中城市和平坦地带,进山进沟增加了企业的基建任务。三机部要求所属企业在总体布局上拉散,结果导致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场地平整)工程量骤增:“三通一平工程加大,施工单位不承担,我们自行组织民工施工,建设周期拖长,汽车运输量加大,长时间紧张,对施工威胁很大。”其所属的十一所场地分散在20公里的山沟中,“土石方大量增加,进洞与埋地后造成大量土石方开挖”;七所1966年下半年几乎打的都是土石方仗。^⑥基建规模过大,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建厂的成本,延迟了投产时间。

分散布局不仅使企业自身建设所需工程量过大,而且也会使国家投资成本上升。国家建委汇报西南三线建设时称:“每个工厂分散建设以后,都要为它修建设公路或铁路专用线,都要为它解决供电、供水问题,……都要为它远距离运输原材料、燃料和协作件。这样做就会多花建设投资,提高生产成本。”^⑦因此,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常常陷入资金不足的困境。

现代工业生产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三线企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企业办社会”,虽然城市的大中型国营工厂皆如此,但毕竟城市的商业系统、公共设施相

① 《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1966年4月30日,甘肃省档案馆,143-003-0768-0028。

② 《甘肃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兰州地区贯彻执行西北局三线会议精神的几点意见》,1966年7月27日,兰州市档案馆,001-1-19660033。

③ 《省机械厅分党组报省委关于三线建设中,地方机械调整、布局、迁厂有关问题的汇报要点》,1964年9月15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15页。

④ 《中国共产党宝鸡市委员会关于1966年上半年三线建设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4日,宝鸡市档案馆,6-2-5。

⑤ 《甘肃省计划委员会关于三线建设情况汇报(第三次)》,1964年11月24日,甘肃省档案馆,144-001-0542-0051。

⑥ 《第三机械工业部四川地区办事处一九六六年基本建设工作的几点体会》,1967年4月1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288页。

⑦ 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166页。

对健全,企业亦可享受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企业搬迁至内地,尤其是进山进沟之后,与职工生活相配套的福利设施皆需要重建,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甚至造成浪费现象。四川省计委反思1965年基本建设问题时指出:“过去建厂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附近,水、电、路的问题比较好解决;现在根据‘分散、隐蔽、靠山’的原则布点,建设项目分散在边远地区,水、电、路、燃料和地方建筑材料、副食品供应等支援配合的问题比较多。”^①

在三线企业周边建设生活福利设施,地方政府投资所占比例甚小且进展迟缓,企业不得自行建设。财政部规定:“在城市范围以外建设的工矿点或工业区,所需的职工生活福利设施,由工矿企业负责投资建设。这部分建设资金,由企业用降低非生产性建设标准所节约下来的钱加以解决。”因此,西北局要求对搬迁至西北地区的三线工矿企业“财贸网点的建设,由工矿企业负责投资。城市以外续建、扩建工矿点需要新添的财贸网点建设的投资,也应由工矿企业负责解决。”^②企业在搬迁过程中既要负责征地补偿费用,也要有必需的三通一平开支,还要投资生活福利设施,时常陷入经费紧张乃至要求追加投资的困局。

由企业自行建设,在增加投资之余,还可能造成铺张浪费的现象。四川省计委反思1965年搬迁项目时称:“缺乏统一规划,从现在已经摆下的建设项目来看,不少的工厂都是一个一个孤立的点,没有根据‘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来合理布点,因而各搞一套公用设施,造成国家资金的浪费。”^③即便有的企业连在一起,但由于所属机构不同,彼此之间互不协商,公用设施也是各自建设,“如拟在江津五城坡的西南射线设备厂和长风机械厂,同在一个取水点各自设取水和相应的一套给水处理设施。这是极不合理的。”^④重复建设、缺乏协调,导致国家和企业资金浪费严重。

(二)上下游产业缺乏协作。

现代化工业生产以产业分工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协作配套皆由国家统一规划。在一五、二五计划时期,我国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

完善的配套体系,然而,企业内迁打乱了既有体系,对三线企业的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四川省计委指出:“沿海现有的生产体系,不是短时间形成的,特别是专业化协作后,迁建厂到内地后,如何解决工艺协作、零部件、技术后方等,……我省得早抓几年,才能保证成批企业内迁能够生产。”^⑤

内地工业与沿海工业发展水平差异甚大,三线企业内迁之后,所需配套物资内地无法供应。甘肃省经济委员会调查本省的产品项目和类型后报告称:“迁建企业来了以后,将有大量的配套和协作产品需要就地解决。据了解,仅一机部搬迁来的七个企业需要协作配套的项目就有八十一项。最近经过开会和一机部的同志共同研究落实,本省可以解决的仅有三十三项,占百分之四十,还有百分之六十需要和外地联系解决。”^⑥

四川省亦面临同样的困境,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四川省计委称:“中央11个部在重庆的迁建、新建企业,要求协作的产品就达2184种,以上协作产品,重庆市可以承担的只有559种,占25.6%,经过挖潜力、设备更新、填平补齐、生产试制等一系列措施后,可增产496个品种,共可增产1028个产品,占要求协作的47%。”^⑦重庆是三线地区工业基础最好之地,然即便经过自身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也只能生产不足半数的配套产品,其余产品仍需要依赖原厂地供应。

内迁企业原有的协作关系仍保留在原厂所在地,在三线建设之初不得不依赖原厂地的物资供应和协作。西北局三线建委第一次会议即认识到此问题的危害:“西北地区工业基础差,底子薄,目前生产和建设需要的绝大部分协作配套产品和二、三类物资要依赖沿海供应。这种情况显然不能适应三线建设和备战的要求,一旦有事,工业有面临瘫痪的危险。”^⑧依靠原有的协作关系,非但不符合战备的要求,而且增加了生产成本,一机部西北工作组检讨1965年迁建工作时称:“去年大批工厂内迁以后,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譬如协作配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内迁厂的绝大部分协作关系都还留在沿海。远距离运输不仅会生

① 《省计委关于四川省一九六五年基本建设方面的几个主要问题》,1965年2月7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138页。

② 《关于西北地区财贸部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和意见》,1966年3月6日,甘肃省档案馆,144-002-0765-0016。

③④ 《省计委关于一九六五年搬迁项目迁建情况汇报》,1965年8月17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51、351页。

⑤ 《省计委关于贯彻全国迁建工作会议简报》,1965年9月25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67页。

⑥ 《甘肃省经济委员会关于贯彻西北局和省委加强三线建设领导的决定的报告》,1965年4月2日,甘肃省档案馆,153-001-0078-0002。

⑦ 《省计委关于贯彻全国迁建工作会议简报》,1965年9月25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67页。

⑧ 《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1966年4月30日,甘肃省档案馆,143-003-0768-0028。

产带来很大困难,也不符合备战的要求。”^①哈尔滨机电厂、上海革新电机厂对口支援兰州综合电机厂,两厂精心组织了内迁设备、人员,但涉及到配套问题,则基本上仍依赖原产地,以电源车产品为例,详见下表一:

表一 兰州综合电机厂电源车协作对象表

序号	协作件名称	协作单位
1	汽车底盘	长春、南京汽车厂
2	汽油机	南京、柳州动力厂
3	保温车箱	沈阳汽车配件厂
4	开关板用电源电流表、频率表	天津、上海电表厂
5	控制开关板及调压器	上海华通厂
6	各种转换开关及小开关插头插座等	上海华一、天津开关厂
7	微型电机	天津微电机厂
8	各种灯具照明灯泡	四机部
9	扬声器、麦克风、电话机	718厂
10	灭火机	上海震旦厂
11	落地池	307厂
12	半导体整流器	718厂
13	坦克时钟	轻工部
14	木工电动工具六种	上海八一电机厂
15	塑料压制件	天津开关厂、远期在兰州
16	申源车型式试验	三机部

(资料来源:《哈尔滨机电厂、上海革新电机厂支援兰州综合电机厂建设计划》,1964年12月1日,甘肃省档案馆,153-002-0207-0011。)

兰州综合电机厂所生产的电源车产品共需要16个协作件,基本上都依靠原厂在华东、东北等地的协作企业供应,而在甘肃甚至西北,并无产品可以替代。四川省也面临此等情况,尤其是涉及高、精、尖产品,四川省计委报告称:“经了解在搬迁项目中,多数地区只是把主厂迁来,配件厂没有迁,有的厂原来就需依靠地方协作,往往这些产品要求质量好、精度高、数量大,迁入我省后现有地方厂担负不了。”^②地方企业非但担负不了,反而有可能影响其原有的生产任务,国家建委提醒到:“西南地区现有机械工业担负这样大量的协作任务是很吃力的。如果勉强这样做,就有把一般修配任务和支援农业任务挤掉的危险。”^③

地方协作关系没有形成,而一些内迁企业在搬迁过程中设备不配套、随机工具不齐全,在内地亦无法购买,影响企业投产。如重庆杨家坪机器厂内迁产品11.4瓦绞车需用的六角车床、无心磨床等六种型号的设备都没有迁来,使产品无法投产;重庆仪表厂校验需用的油湿测试设备和工具显微镜都没有,使产品无法校验;而天原化工厂共迁750台套设备,经检查400台套设备中,缺件短件的达200余台套。^④

面对此种情形,内迁企业不得不自己解决配套协作问题,西北局计委称:“有一些单位为了方便或由于情况了解的不够全面,没有或者很少考虑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和协作问题”,结果导致水电部的兰州修造厂(搬迁项目)第一期工程内容中要自己搞年产五百吨能力的电焊条车间;化工部迁往兰州的油漆厂,要搞包装用的制桶车间;铁道部宝鸡桥梁厂要在本厂增建制氧站。^⑤内迁企业自己建设配套产业,加大了生产成本,延迟了投产进度,使得本应依照“小而分”的原则走专业化协作道路变成了“大而全”情况下的各自为营,分散了企业的精力和资本。

三、三线企业配套协作的解决路径

在三线建设决策之初,中共中央即高度重视工业发展中的协作问题。1965年1月,负责制定“三五计划”的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称:“各个项目一定要成龙配套,这样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我们认为,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恐怕要根据各行业的情况,结合起来布点”,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⑥国家建委在西南三线建设中采取“一般军工企业和民用工厂的建设应当兼顾国防安全和经济合理的要求,尽可能靠近原料、燃料、水源、电源,并且把一些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工厂成组地布置在一起,建成一些适当分散的工业点。”^⑦因此,为了在内地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协作关系,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建设小城镇与地方小型配套企业;搬迁企业拆分筹建专业厂,相互配套;其他地区搬迁配套企业与技术支援三种办法。

(一)兴建小城镇与地方小型配套企业

三线企业需要依照“分散”原则布局,1964年国家计委安排该年度搬迁29个厂,并要求“除了个别特殊

① 《第一机械工业部西北工作组一九六五年迁建工作总结报告》,1966年2月12日,甘肃省档案馆,144-002-0765-0015。

②④ 《省计委关于一九六五年搬迁项目迁建情况汇报》,1965年8月17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53页。

③⑥⑦ 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167、137、140、166页。

⑤ 《三线建设需要注意专业化和协作》,1965年5月24日,甘肃省档案馆,153-002-0225-0013。

情况外,都不准进入成都、重庆、昆明、贵阳、西安、宝鸡、兰州、玉门8个城市。……这些项目大都是迁到中小城镇或大城市的远郊区”。^①大中城市不接纳三线企业一方面是因为考虑分散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因为大中城市工业已经饱和,并无过多的水电资源支持新建企业,四川省计委解释称:“成渝两市已经摆了不少大型工厂,且很集中,水、电供应已很紧张,并应控制城市人口的发展,基本不宜再摆新的工厂。”^②

因此,将三线企业分配至大中城市以外的中小城镇,既有利于分散,又能充分利用各地方资源。西北局召开迁厂问题讨论会时指出:“在今后的迁厂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安排一些项目到中小城镇。这样既可以贯彻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又可以利用这些居民点在生活供应和劳动资源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做到比较经济合理。”^③西北局三线建委副主任李广仁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少花钱,上马快,在工业比较有基础的大城市搞是有利。但从备战观念看,在大城市搞不利。……对一般民用工业配套产品,今后应注意向中、小城镇发展。打算再多搬一些迁建项目,在中小城镇分散办地小群。”^④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后,战争威胁又进一步,各地更注重将工矿企业迁至中小城镇,兰州军区1969年4月召开三线建设座谈会时指出:“要‘多搞小城镇’,在战略纵深地区开辟小城镇式的新的工业区,新工业区要大、中、小项目结合,中央、地方项目结合,各行各业项目相应协作配套。”^⑤中小城镇即各省的专区和县及县以下的行政中心。

三线企业分散至小城镇后,即要围绕其建设一批“地小群”工业,与之配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特别指出西北三线建设要从万事求人做到万事基本不求人,方法即:“要大办地小群,扶助公社办工业。……关于协作配套的规划,地方要积极组织,研究规划、布点,争取今年(1966年)达到百分之二十,一九七〇年达到百分之八十,必须大、中、小结合协作配套。”^⑥按照刘澜涛的指示,西北局在召开三线建设座谈会时明确提出:“大办地方小型工业,是解决协作配套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地方小型工业,要边发展,边巩固,边提高。

对于已经办起来的,注意帮助他们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解决原材料来源等问题,使之健康发展。”西北局还要求西北地区工业的协作配套应该走大庆道路,兴办一批地小群,扩散一批卫星工厂。^⑦

为三线企业配套的一线工厂往往有其他的协作任务,加之搬迁经费有限,在三线建设初期并不能随三线企业一同迁至内地,因此国家计委在全国搬迁会议上要求:“现有内地的地方工业,包括一些手工业在内,要进行适当的调整,逐步进行技术改造,以便增加配套产品的生产。国家在分配投资、材料、设备时,要给地方的协作配套厂以适当的照顾和支持。中央各部今后不要轻易接收地方工厂,或者把协作配套厂升为主机厂。”^⑧依据此指示,四川省计委要求:“比较简单的配套件,可由地方负责协作,但地方承担协作的有些企业必须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⑨西北三线建委副主任李广仁指出发展地方小型工业,要做到“二定”“三落实”。“二定”: (1)生产什么?定产品方向,(2)为谁服务?定协作关系。“三落实”:要求做到人员、设备、原材料三方面都落实。^⑩

四川省计委亦安排地方工业着重发展为三线企业配套的产品:“对要求配套协作产品,应本着就地安排,首先挖掘原有工厂潜力,按工艺相近组织协作,否则可以统一纳入地方专业化。尽量利用地方现有工艺协作生产。”四川省计委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于搬迁项目所要求的生产协作,凡是当地生产的都尽可能满足其需要,当地虽不产,但有技术条件和设备,辅导其转向为搬迁项目服务。四川省原有工业基础在三线地区相对比较发达,因此其地方配套产品的生产试制亦进展迅速,据重庆市1965年8月统计,已安排各工业行业生产为搬迁项目协作配套的产品1028种,295万套件,总产量达1601吨,已有76个厂、社生产协作产品。^⑪一年之内,重庆市安排本地企业生产协作产品的种类即翻了一番。

(二)搬迁企业拆分筹建专业厂,相互配套

三线企业搬迁至内地后,苦于无协作配套的企业和产品,因而不得已自建协作体系,使企业向“大而全”的方向发展,然而,“大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工业生产

①⑧ 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95、186页。

② 《省计委党组报杨书记并省委关于选厂布点意见的请示》,1964年9月4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01页。

③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的三线建设》,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02、418页。

④⑩ 《西北局三线建委副主任李广仁同志关于协作配套的意见》,1966年7月,甘肃省档案馆,240-001-0087-0003。

⑥ 《王林书记在西北局三线建设座谈会上总结报告精神》,1966年7月,甘肃省档案馆,240-001-0087-0003。

⑦ 《西北三线建设座谈会会议纪要》,1966年7月25日,甘肃省档案馆,240-001-0087-0002。

⑨ 《省计委关于贯彻全国迁建工作会议简报》,1965年9月25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67页。

⑪ 《省计委关于一九六五年搬迁项目迁建情况汇报》,1965年8月17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51页。

的专业化协作道路。1964年7月15日,中央调整工业组到四川考察机械工业规划布局时提出:“全能厂尽可能调整为专业厂;建立设备维修体系,着重规划机床、电机、锅炉等所需专业维修工厂和车间。”^①四川省机械工业厅亦认为协作分工是历史趋势,严禁企业生产产品过多:“一个企业负担品种过多,与‘小而分’精神不相符合的,应适当分散、专业化。如重庆电机厂承担了大小电机、变压器等几十种产品,可以考虑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并要求拆分的专业化企业应该扩散到城市郊区或到其他县靠山、靠洞另建。^②

与四川省机械工业拆分重建的思路相同,1964年9月21日,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强调:“新建工厂必须是‘小而分’,而不是‘大而全’,机械工业必须做到专业化和协作,原料工业必须综合利用。”^③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小而分”的建厂原则,西北局在特意制定的《关于规划和解决三线建设中协作配套的几点意见》中指出:“现有大厂中,凡适宜搞专业化的车间、工段、小组,可采取扩散的办法,划出来单独建立专业化的小厂;正在建设和将要建设的工厂,凡适宜搞专业化的零部件或工艺,应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划出来单独建厂。”^④

因此,西北局计划委员会办公室按照专业化协作的要求于1965年5月24日对西北地区三线企业进行了重新调整:“我们认为,新建或搬迁的厂子,应当认真贯彻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这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必须吸取过去的经验,不能再搞‘大而全’和‘小而全’的企业,否则安排还未就绪,就又要进行调整。”^⑤照此原则,西北局计委要求“水电部兰州修造厂的电焊条车间,本厂不需要再搞,因为兰州有一个长虹电焊条厂,全部建成后的生产能力八千吨,可以提供兰州地区的需要。宝鸡地区的氧气,最好统一由宝鸡市成立一个氧气站。宝鸡地区的铸造,目前可以根据不同厂的需要自行考虑,但铸造应该统一由一机部和地方考虑,组织一个铸造中心,没有必要每个企业都搞。”^⑥西北局希望对三线企业和地方企业进行统一筹划,广泛组织地区的专业化协作,避免各自为战,浪费国家投资和设备。

三线建设需要在地区内部形成协作配套,以避免

过度依赖他区,不利备战且运输成本过大。冶金工业部希望四川建设成为冶金工业稳固的战略后方,在本行业布局时提出:“有色工业,云南重点搞钢,贵州搞铝,四川首先搞镍及铅锌矿,重点是会理镍矿、会理锌矿。西彭的红古城铝镁加工厂要力争早建。稀有金属四川搞钽、铌、锂,重点在甘孜、阿坝。”^⑦分工的思路十分明显。铸锻件是重工业生产的必备品,国家计委要求:“搬迁企业的协作关系,应当根据备战的要求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力争在本地区的范围内建立,特别是工艺协作、大量的零部件和一般的铸锻件尽可能就近建立。”^⑧即要在三线企业周围形成配套的零部件生产企业。

甘肃天水的海林轴承厂是1966年内迁的三线企业,然而在西北地区并无适合的锻件提供,导致海林轴承厂投产时间一再延后,天水专区生产指挥部甚至希望海林轴承厂能够从其母厂洛阳轴承厂暂借一套锻件设备,进行土法生产。为了在地区内部形成协作,天水专区生产指挥部邀请海林轴承厂、天水铸锻件厂和负责基建的七局二公司召开座谈会,要求七局二公司加快天水铸锻件厂的施工,使其能及早供给海林轴承厂投产所需的锻件问题,并在管理体制上进行了调整:“铸锻件厂与海林厂相距50多公里,在运输供应、质量检验、互相联系等方面,是存在一定困难。……可以将铸锻件厂的锻工车间交海林厂直接领导管理,这样,对海林厂的锻件协作是有利的。”^⑨即地方政府希望在地区内部形成上下游企业的协作配套,甚至不惜改变工业管理体制。

(三)沿海搬迁协作企业和技术支援

三线企业在原址已有上下游的产业配套,搬迁至内地后新的协作关系一时之间尚难形成,1965年8月底,全国搬迁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计委清醒地认识到:“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工业生产协作关系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采取积极措施,抓紧解决。”因此,国家计委要求在新的协作关系未建立以前,一、二线地区原有的协作关系应继续维持,不能中断。^⑩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对内迁的三线企业称:“原有老协作关系,要一律维持现状,不能打乱。待

①② 《省机械厅分党组报省委关于三线建设中,地方机械调整、布局、迁厂有关问题的汇报要点》,1964年9月15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14、317页。

③⑧⑩ 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89、186、186页。

④ 《关于规划和解决三线建设中协作配套的几点意见(草稿)》,1966年3月4日,甘肃省档案馆,144-002-0765-0014。

⑤⑥ 《三线建设需要注意专业化和协作》,1965年5月24日,甘肃省档案馆,153-002-0225-0013。

⑦ 《省冶金厅分党组关于冶金工业三线建设等情况简报》,1964年9月16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28页。

⑨ 《关于天水铸锻件厂与海林轴承厂协作问题座谈会议纪要》,1969年3月4日,天水市档案馆,102-3-132。

迁厂告一段落,腾出手来再在新的基础上组织新的协作。”^①

虽然各地也都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并开展专业化协作,但内地工业发展水平与沿海地区相差悬殊,缺乏设备和技术的内地并不能完全解决配套问题。如成都配件厂生产的缸套,在上海时都用本溪钢,迁至四川省之后便无法解决;江北机器厂虽把设备迁来了,但操作大型镗床,龙门刨床的工人没有来,造成设备无人操作;天津仪表厂内迁时对操作齿轮圆球、计量室等关键工种和必要的工艺设计人员都没有相应的迁来。四川省无法解决上述企业所需的技术、设备、人员和高端产品,因此建议:“对于一些尖端、缺配套的重要产品,而且在短期内无法解决的,建议中央考虑搬迁项目中,尽可能和主机厂一同迁来。否则暂时保持与原来协作关系。”“要求迁出厂考虑尽量将迁出的设备、人员工种配套,为达到搬迁中的安全迅速,请迁出厂派出工作责任心强的人护送。”^②四川省计委认为除挖掘地方潜能外,解决专业化协作“见效快、花钱少,又能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是:凡质量要求高的比较难解决的配套产品,须要提请中央各部在安排迁建、新建厂时,通盘规划安排”。^③

西北局亦认为“继续沿海搬迁来一批企业和支援一批技术力量,是加速发展三线工业的有效办法。……应当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内,逐步做到大部分协作配套产品和三类物资的供应立足于区内。”^④因此,西北局1965年接纳三线项目多为在西北地区形成重工业基地所必须的配套协作企业,以一机部所属六项搬迁企业为例,见下表二:

表二 1965年一机部从一线迁建到西北的三线项目表

编号	一线企业	三线企业	生产产品	任务
1	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电机厂 上海革新电机厂	西北火电设备厂	军用电源车	解决军工需要
2	哈尔滨电表厂	兰州精密电表厂	精密电表	解决军民需要,补三线缺口
3	上海联研仪器厂	天水电工仪器厂	交直流仪器	解决军民需要,补三线缺口

① 《省机械厅分党组报省委关于三线建设中,地方机械调整、布局、迁厂有关问题的汇报要点》,1964年9月15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18页。

② 《省计委关于一九六五年搬迁项目迁建情况汇报》,1965年8月17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54页。

③ 《省计委关于贯彻全国迁建工作会议简报》,1965年9月25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67页。

④ 《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1966年4月30日,甘肃省档案馆,143-003-0768-0028。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一线地区已经生产的军工产品逐渐转移到二三线重复安排试制的通知》,1966年2月18日,甘肃省档案馆,155-003-0215-0007。

⑥ 参见袁为鹏:《甲午战后晚清军事工业布局之调整》,《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306-308页。

4	上海大来电业厂	白银电缆厂	电线导体	解决西北地区配套需要
5	哈尔滨锅炉厂	兰州电焊条厂	电焊条	补三线缺口,解决西北地区配套需要
6	上海曙光机器厂	兰州真空泵厂	真空泵及真空应用设备	解决生产军工科研需要

(资料来源:《一九六五年工业交通企业和国防工业企业从一线迁建到西北三线项目》,1964年11月4日,甘肃省档案馆,144-001-0549-0017。)

从上表可以看出,1965年一机部内迁工厂所生产的产品都是西北地区所没有,或者为其他企业配套为目的。因此,在搬迁骨干项目的同时,与之紧密相连的必需的配套厂也随之搬迁,成为解决三线地区工业协作的重要途径。

除此之外,若配套企业在原厂地有饱和的生产任务,则更多采取技术支援的方式。1966年初,一机部为了在内地形成一个新的成套的军工生产基地,安排二、三线地区试制一批一线地区已经生产的产品,在突破技术难关问题上,一机部要求一线地区企业要在六个层面对口支援二、三线地区的企业:“1、提供产品的全部图纸和技术资料;2、提供完整的产品样机;3、帮助培训工人;4、解决产品试制过程中所需的关键材料和配套产品;5、给予技术指导;6、帮助试制产品的试验、鉴定。”^⑤相较于搬迁工厂,技术支援是另一种较为隐性的三线建设形式,减少了三线地区配套企业技术攻关的时间和投入,为在内地尽快形成一批专业化的地方协作工厂贡献巨大。

四、结 论

近代以来,我国工业经历了从东到西、从沿海向内陆的发展过程。在洋务运动、实业救国、黄金十年、一五计划等一系列工业建设中,历届政府虽有意识地改变东西部工业分布不均衡的格局,^⑥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沿海与内地工业实力差异仍十分显著。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

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①因而，改变工业布局成为新中国工业化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

促使改变的另一缘由则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局势并不稳固，尤其是美蒋威胁东部沿海，中央高层一直对可能到来的战争充满警惕，而战时状态下从东部搬迁工厂至内地，成为国防战备的重要方式。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②

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抗美援朝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实现，三线建设即是在战备状态下完成沿海工业体系在内地的备份。然而，中央高层对战争局势估计过于严重，尤其在不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内迁企业大多依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布局。片面强调进山进沟，缩小对空目标，使内迁企业的发展违背了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主要表现为：不靠近原料产地，不靠近销售市场，不靠近交通要道，生产成本过大；搬迁和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过多，使有限的资金内耗于生产生活福利改善之上；脱离原有的协作关系，短期内并无配套的上下游产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三线企业只重国防安全，轻视经济效益。在三线建设初期，从中央到地方都强调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在内地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配套与协作体系，进而形成工业基地。如西北局便规划了“陕西：重点发展以汉钢和特殊钢厂为中心的钢铁工业，以渭北黑腰带为中心的煤炭工业；甘肃：重点

发展以酒钢为中心的钢铁工业、电耗较大的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工业；青海：重点发展以都兰、龙羊峡、木里和柴达木为中心的钢铁、电力、煤炭、石油工业”。^③四川省计委亦规划了“泸州到宜宾地区，宜摆用水和排污大的化工厂和机械加工工业；广旺铁路沿线，地形隐蔽，可布置国防工业和国防仓库；合川、遂宁、南充等地区，宜布置棉、绢纺织等轻工业和运输量小的机械加工工业。”^④从此后的历史进程来看，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一个工业协作区，基本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出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工业格局。^⑤

当然，这种协作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三线建设初期由沿海搬迁至内地的基本是与备战有关的骨干式企业，其布局的地点也是工业协作区的中心。此后，为了协作的需要以及珍宝岛战役之后更加严峻的战争形势，在内地围绕骨干企业逐渐自建或搬迁一批配套企业，进而形成一个有产业分工的工业基地，时人称之为“填平补齐”^⑥。然而，三线企业选址和协作关系建立是特殊时代下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和下放企业管理权的影响下，三线地区稳固的工业协作关系虽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却在改革开放初期仍未完全确立。随着国际局势好转，1983年国家开始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发挥作用，三线地区初步建立起的协作关系遭遇商品市场和国家政策转变的双重冲击，三线企业逐步走出大山乃至三线地区，其在计划经济年代建立起的协作关系被打乱后改由市场进行调节，三线地区和三线企业也随之进入了艰难的转型时期。

〔作者张杨，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上海 200240〕

责任编辑：卢敦基

①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84、85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的三线建设》，第418—419页。

④ 《省计委党组报杨书记并省委关于选厂布点意见的请示》，1964年9月4日，《三线建设在四川·省卷》（上），第301—302页。

⑤ 正因如此，在三线调迁之际，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经过调查认定绝大多数三线单位是成功的，仅有7%的企业布局不合理、建设不成功，需要异地搬迁。参见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311页。

⑥ 填平补齐本是中共在老区土改时提出的一个名词，即以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做到生产资料相对平等。参见李盛平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第781页。三线建设初期的填平补齐指的是根据工业协作的关系，尽快补上协作缺乏的企业、设备和产品。